

二十世纪文库

文化的起源

马文·哈里斯 著
黄 晴 译



华夏出版社

文化的起源

WENKU.

马文·哈里斯 著

黄 晴 译

责任编辑：赵洁平

封面总体设计：郭力 钮初 呼波
李明 王大有

本书封面设计：王洪流

CANNIBALS AND KINGS The Origins of Cultures
by

Marvin Harris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U.S.A., 1978

文化的起源

〔美〕马文·哈里斯 著

黄晴译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四五条内月牙胡同10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6.125印张 140千字 插页2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8600册

ISBN7—80053—316-6/G·057

定价：2.50元

DH 87/03

编者的话

《文化的起源》是一部深入浅出的人类学方面的著作，是卓越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的名著。作者依据近年来国际考古与人类学的最新资料与研究成果，对人类的本性、文化的起源及兴衰，特别是人类社会、人类文化及其多种形态产生的原因，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作者还对人类的今天和明天面临的根本矛盾这一令人困惑而又令人深思的问题做出了被称为“权威性的解释”。

作为人类学家，作者不是用基因或心理因素，而是用人类对变化着的生态条件的适应来解释人类变化无穷的文化行为。作者认为，人口繁衍、生产强化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枯竭，迫使人类作出选择：或是寻求新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以继续发展，或是走向毁灭。这是了解人类发展的一把钥匙，也是今天全人类应该主动面对的一个严峻挑战。与达尔文对生物进化形式的探索相似，哈里斯在本书中告诉读者：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为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是怎样采取了其特殊的文化形态的。

本书不仅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的反响，并且广泛地影响了当今这一代知识分子。作者在对以往人类行为的严肃反思中，为当代人类提出了醒世的大问题：“为了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好，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生活为什么常常变得更坏。因此我认为无视造成文化进化的因素，无视限制理想结果的不利条件，乃是一种道德上的口是心非。”

几年来的事实已证明了本书出版时(1977年)专家们对它的评

论：“它值得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现在把它介绍给我国的广大读者，以开阔我们的眼界，启沃我们的思想。

序 言

若干世纪以来，西方人一直心安理得地沉溺于物质进步将永无止境的信念。我们把汽车、电话和暖气视为今天的生活比我们祖父母的生活更为舒适的证明。尽管我们也意识到进步的过程可能是缓慢曲折的，有时还会出现倒退，但我们仍觉得未来的生活从总的方面来说会比现在充裕得多。

科学理论启沃了这一信念，这一理论大部份是在一百年前形成的。在处于有利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家看来，文化进化似乎是一种攀登险峰的朝圣历程，高踞峰颠的文明人可以俯视“低级”文化经历的种种不同的野蛮蒙昧阶段。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夸大了所谓野蛮人的物质贫困，同时对工业“文明”带来的好处言过其实。他们把旧石器时代描绘成充满恐惧不安的时代，当时的人们白天汲汲于寻觅食物，夜晚则躲进毫无舒适可言的岩洞，蜷缩在火堆旁，洞外到处是巨齿虎。只是在我们的“野蛮人”祖先发现了种植农作物的秘密后，他们才有足够的闲裕在村庄里定居，盖起了舒适的住房。也只是在此时此际，他们才能储存食物，有时间去思考和创造。据说这随之导致了文字的发明，城市的创建，有组织政府的产生以及艺术和科学的繁荣。随后出现了蒸气机，导致了工业革命这一更为迅猛的新发展阶段，伴随着这一革命，出现了不可胜计的批量生产节省劳力的机器和丰富生活内容的技术。

克服上述思维定势并非易事。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人却不能不意识到工业社会只是金玉在外，徒有其表；尽管传播媒介把人们

工余课后的生活描绘得乐趣横生，但我们的后代子孙为了保持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一点乐趣，将不得不更加卖力地工作。伟大的工业繁荣不仅用垃圾毒物污染了我们的地球，还不断生产出日益昂贵和低劣的产品和服务。

本书的目的旨在改变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所持有的人类永远进步向上的旧观点，用一种对文化进化更为现实的描述取而代之。现今我们生活水准面对的种种难题古已有之。技术未能维持我们的文化，这在历史上也并非首次。我们的文化也不是第一个达到增长极限的文化。以往的技术常常不能维持当时的文化，最终只好被新技术所取代。而在人类达到并超越某一发展极限后，又要再次达到和超越这一发展极限。被我们视为进步标志的许多东西实际上只是重新达到史前人类普遍的享受标准而已。

石器时代的人们比紧随其后的多数人活得更健康：在罗马时代，世界上的疾病之多并无前例；即使到了19世纪初，英国儿童的预期寿命恐怕和20,000年前也无多少差别。此外，石器时代的猎人维持生计的工作时间比典型的中国和埃及的农民或当代工人（虽然他们有工会）都要短。至于美食娱乐、审美情趣一类人生乐事，只有今天美国的一流阔佬才能享受到早期狩猎采集者所享受到的乐趣。当代的经理们工作5天才能换取两天时间去享受森林、湖泊和清新空气。今天，全家人30年的辛勤工作和积蓄才能使他们有权欣赏窗外的几平方呎绿草地。而这些人还只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人。美国人常说：“食不可无肉，”他们的食物中动物蛋白确实不少（有人说太多了），而三分之二的当代人却不得不甘于蔬食淡泊。在石器时代，所有人都吃高蛋白、低淀粉食物，而且是未经抗菌素和人工色素处理，未经冷冻和真空消毒的肉类。

然而，我写这本书并非为了贬低当代美国人和欧洲人的生活水平。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今天的生活远较我们上一世纪的曾祖父

母要好。也无人能否认科学技术使数亿人改善了他们的饮食健康状况,延长了寿命,获得了更好的物质享受。在避孕、抗御自然灾害和交通通讯的便利等方面,我们显然超过了以前所有的社会,包括最富裕的社会。我所考虑的首要问题并非过去150年中的成就是真是假,而是这种成就能否永远保持下去。近年来的工业繁荣究竟应被视为物质和精神进步这一永恒上升曲线的端点,还是应被视为一条时有起伏的曲线上一个最新的凸出点?我认为,第二种观点与现代人类学的事实和阐述原则更加吻合。

我的目的是揭示物质繁荣和精神繁荣的关系以及各种体制在增加生产和控制人口增长上的得失。在过去,由于缺乏安全有效的避孕手段所造成的不可抗拒的生殖压力导致了周期性的生产强化。这种生产强化又总是造成环境资源的枯竭,后者通常又会导致新的生产体制——而每一种生产制度的典型特征都是合法化的暴力、苦役、剥削和残忍。这种生殖压力、生产强化和环境资源枯竭看来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家庭结构、财产关系、政治经济和宗教信仰,包括饮食嗜癖和禁忌的进化过程的钥匙。现代避孕流产技术的介入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因为这些技术通过控制受孕直接解决生殖压力问题,从而消除了以往所有节育手段给人造成的痛苦和折磨。但是,新的避孕流产技术可能出现得太晚了。当代的国家社会正全力以赴强化工业生产模式。我们只不过才开始为新一轮生产强化所造成的环境资源枯竭付出代价,而且无人可以预言为了超越工业秩序的增长极限应采取什么新的控制措施。

我知道我的历史决定论可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我随便地把食人习俗,博爱宗教,素食主义,杀婴行为和生产利弊扯在一起,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快。其结果是,人们可能会指责我想把人类精神禁锢在一个机械关系的封闭体系中。但我的意图恰恰相反。一种盲目的决定论一直统治着我们的过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必能统

治未来。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应阐明“决定论”一词的意义。从20世纪科学的角度来看,人们不再认为因变量和自变量之间存在机械的对等关系,不再从这一意义上谈论因果关系了。在基本粒子物理学中,海森堡提出的“不确定原理”以粒子的因果或然性取代了因果必然性,这一原理早已占据了统治地位。“有一例外便不成规律”的说法在物理学中已行不通了,因此我个人无意将这一说法加诸于文化现象。我所说的文化现象中所存在的决定论关系是指在相似的条件下载相似的变量一般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因为我相信物质发展过程与道德选择的关系是一种或然性和相似性的关系,而不是必然性和相同性的关系;因此我毫无困难地既相信历史决定论,又相信人类有实施道德选择和自由意志的能力。事实上,我坚持认为,和物质发展进程与价值观之间正常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的,难以预测而似乎不可能的历史事件仍有发生的可能,因此我们每个人都有对历史做贡献的责任。但是,说我们人类有能力按照我们自由选择的标准去创造文化和历史并不等于说历史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事实远非如此。我将要阐明,所有文化总的来说都是沿平行和会聚的轨道演进的,对生产、生殖、生产强化和资源枯竭这一进程的认识完全可以使我们预测文化演进的轨道。此外,本书还描述了世界各地存在的既令人厌憎,又为人崇奉的习俗和宗教。

依我看来,自由意志和道德选择实际上对社会生活体制迄今为止的进化方向未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如果我的看法正确,那些有心保护人类尊严,使其免受机械决定论威胁的人们应该和我共同思考这一问题:为什么迄今为止的社会生活大多呈现出可以预见而非不可预见的格局?我确信,在人类为实现和平、平等和富裕这些遥不可期的目标而进行自由选择时,现存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

未能认识到物质进化过程正是普遍的战争、不平等和贫穷的根源。由于文化科学有意识地忽视了这一点，结果世界上充斥着这样的道德说教者，他们坚持把外界潜移默化强加于他们的意愿说成是自己的自由意愿；与此同时，由于不理解自由选择限制性因素，数百万原本会自由的人又给自己套上的新的枷锁。为了使社会生活变得更好，人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社会生活为什么常常变得更坏。因此我认为无视造成文化进化的因素，无视限制理想结果的不利条件，是一种道德上的口是心非。

目 录

序言	(1)
一、文化与自然	(1)
二、伊甸园中的谋杀	(5)
三、农业的起源	(16)
四、战争的起源	(27)
五、蛋白质与悍民	(41)
六、大男子主义与恋母情结的起源	(50)
七、原始国家的起源	(62)
八、哥伦布之前的中美洲国家	(79)
九、食人王国	(92)
十、神的羔羊	(107)
十一、禁食之肉	(123)
十二、神牛的起源	(134)
十三、水利陷井	(148)
十四、资本主义的起源	(159)
十五、工业的幻想	(171)
后记与道德独白	(181)
作者简介	(185)

一、文化与自然

在欧洲大发现的时代中派遣出去的探险家们迟迟才把握了习俗和制度的世界性模式。在某些地区——如澳大利亚,北极区,南美和非洲的南端——他们发现有些人的集群仍如欧洲早已被人遗忘的石器时代的老祖先一样生活着:二十或三十人结伙成群,散布于广阔的地域内,不断地迁徙流动,全凭狩猎和采集野果为生。这些狩猎者和采集者似乎属于一个罕见和濒于危绝的人种。在其他地区——如美洲东北部的森林区,南美的热带丛林区以及东亚地区——他们发现了较为稠集的人口居住于较为固定的村落中,他们靠农业为生,组成了一两个大规模的公社,但在这些地区,武器和工具仍是史前时代的老古董。

在亚马孙河和密西西比河沿岸以及太平洋的岛屿上,村落的规模更大了,有的村落有上千人之多。有些村落还组成了近乎国家的联盟。这些村社大多以敌人的头颅为战利纪念品,将战俘活活烤死并在仪典盛宴时吃人肉,于是欧洲大肆宣扬他们的“野蛮”。然而事实上,“文明的”欧洲人不也折磨他人吗?巫术审判即可为例。此外,人们还应记住,欧洲人并不反对把一城一城的人斩尽杀绝(尽管他们对同类互食大惊小怪)。

当然,在其他地方,探险者们也见到了极为发达的国家和帝国,这些国家由暴君和统治阶级控制,靠常备军保卫。正是这些伟大的帝国及其城市、纪念碑、宫殿、庙宇和财富最初吸引了所有的马可李罗们和哥伦布们去飘洋过海,横越大漠。世上有个中国,一

个最伟大的帝国，幅员广阔、文化发达的帝国，其统治者对“红夷”，对化外小国的进贡者不屑一顾。还有印度，这地方崇奉牛，每个人因前世积善多少而造成今生际遇不同。此外，还有土著美洲人的国家和帝国，这是个自成一体的世界，有其独特的艺术和宗教：有着宏伟石筑城寨，吊桥，旱涝保收的产粮区及国家管理型经济的印加帝国。还有阿兹台克人^①，他们的神嗜血成性，专食人心，不停地搜取新的牺牲者。最后是欧洲人自己了，他们也有自己的奇特之处：以耶稣的名义去打仗，为谋取利润强买强卖，由于掌握了机械技术而可以以少胜多。

这一模式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有些人抛弃了狩猎和采集植物的生活方式而其它人却仍旧保持这种生活方式？在务农的人们中，为什么有些人安于村社生活而其他人却逐步走向建立国家？在已经建立国家的人们中，为什么有些人建立了帝国而其他人则没有？为什么有些人崇拜牛而其他人却用人心饲喂吃人的神？难道不是一个而是一百亿个白痴在讲述人类的历史，而历史仅仅不过是一出机会和情欲的戏剧？我以为并非如此。我认为存在着一种可以理解的进程，它约制着共同文化形态的持续，在平行或相异的路线上促发变化，决定它们的嬗变。

这一进程的核心就是增加生产的倾向。这种强化——即土壤，水，矿物的更多投入或是单位时间和土地面积上更多的能源投入——是在生活水准面对威胁时人类多次采取的对策。在早期，这种威胁主要来自气候的变化和人口及动物的迁移。后来，国家间的竞争成了主要的诱发因素。不论其即时原因如何，这种强化都是阻碍生产力的，因为人们或迟或早要在更遥远、更不可靠、更匮乏的动物、植物、土壤、矿产和能源上打更多的主意，势必导致环境的枯竭

^① 墨西哥的印第安人。

和生产效率的降低。效率的降低相应导致了生活水准的降低——这恰与预期结果相反。但是，这一进程并非简单地以每个人要更多地工作，更少地获得吃、住等必需品为结束。在生活水准降低时，成功的文化会创造新的，更有效的生产方式，这一方式或迟或早将再次导致自然资源的枯竭。

为什么人们试图用强化生产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呢？从理论上说，无须劳形苦身即可获得美食，健康长寿的最简易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非增加生产。假如出于某些人类不能控制的原因——比如说气候的不利变化——每人的自然资源供应量减少了一半，人们无须用加倍工作的办法予以补偿。相反，他们可以采取削减人口一半的办法。或者毋宁说，如果不是存在重大困难的话，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

既然异性恋爱行为是我们种族延续所依赖的一种遗传学上规定下来的关系，那么减少人类的繁衍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中，有效的人口控制本身就包含了降低生活水准的办法。例如，如用避免两性关系的办法来减少人口，人们就很难宣称一个群体的生活水准得以保持或提高了。同样，如果让助产士去踩产妇的肚子，以此去杀死胎儿，也常常连产妇一起杀死，用这种方法来降低一个群体的生殖力，那么，尽管活下来的人能吃得好一些，但他们的生活期望并未改善。实际上，在人类历史的多数时期内，最普遍使用的人口控制方法是杀害女婴。人们从文化上不把女婴当做人，从而减缓了他们杀死或饿死女婴时所承受的精神痛苦。尽管如此，怀胎九月的机体代价却不是可以轻易抹去的（当代的流产拥护者也同样不把胎儿视为婴儿，我也是其中一分子）。可以肯定地说，多数杀害婴儿的人并不想让自己的婴孩去死。但另外的选择——大大降低整个群体的营养，性生活和健康的标准——却常常被认为更难让人接受，起码在国家出现之前的社会中如此。

我所要说明的论点是，人口控制常常是一种代价高昂以至痛苦的过程，是个人压抑的一个根源，托马斯·马尔萨斯还指出，这种状况在未来所有时代也势必如此（在橡皮避孕套发明后，他的这一论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这种压抑感——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生殖的压力——促使国家出现以前的社会不断地强化生产以维护或提高总的生活水准。如果不是因为在控制生殖中要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我们的种族就会永远停留在相对安宁平等，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小国寡民状态。但由于缺乏有效温和的人口控制手段，使得这种生活方式难以稳定持久。在上一个冰河期结束时，由于气候变化，大野兽数目减少，生殖压力使我们石器时代的祖先自然地采取了强化生产的对策。狩猎和采集生产方式的强化又相应为农业的兴起开辟了道路，而农业的兴起又相应激化了群体间的竞争，战争日益增多，国家开始演变形成——不过我已离题太远了。

二、伊甸园中的谋杀

对于人从部落生活向农业村庄生活的转变，公认的解释常常是这样的：狩猎者和采集者必须用全部时间来搞食物。他们不能生产超出生计必需以上的剩余物，因而他们长期处于饥病交加的状态，处于灭绝的边缘。因此，他们很自然地希望定居下来，在固定的村庄生活，但他们从未产生过播种的想法。一天，一个不为人知的天才决定向一个洞里扔几粒种子，不久，人们在一定的地区开始了种植。人们无须再东奔西跑去搜寻猎物了，也有了新的闲暇去思考。这导致了技术上更为迅速的进一步发展，从而带来了更多的食物——“生存必需以上的剩余物”——这最终使一些人有可能脱离农业，成为艺术家，传教士和统治者。

这一理论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假定我们石器时代祖先的生活极为艰难。对公元前三万年至一万年旧石器时代进行考古获得的证据清楚表明，当时的猎人享受着相对高标准的舒适和安全。他们不是蹩脚的二把刀。他们在水晶石的断裂，削凿和制作成形上运用自如，这成为他们技术的基础，他们被恰当地称为“古今石匠之大师”。他们造成了极薄、削凿工夫极细的“月桂叶”刀，长度有11英寸，厚度却只有0.4英寸，靠当代工业技术也不能将其复制出来。他们用精巧的石钻和称为鏊刀的雕刻工具造出了复杂的倒刺骨片和鹿角鱼叉尖，形状极好的鹿角标枪掷板，可能用于装饰兽皮衣的骨针。那些用木头、纤维和毛皮制作的东西已经腐朽了，但这些东西出自高手，一定也不同凡响。

同一般的看法相反，“洞穴人”知道如何建造窝棚，他们是根据地区可能的条件和气候季节需要来利用洞穴和岩顶的。在南俄，考古学家发现了猎人在40英尺长，12英尺宽的浅坑上用兽皮搭了个窝棚的遗迹。在捷克斯洛伐克，一种设计直径为20英尺的圆形地面冬季居室在两万年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所使用。这种居室用厚密的兽皮铺地做床，还用大量干兽粪或附连油脂的骨头做燃料取暖，在许多方面，这种居室的舒适超过了当代城市中心的公寓。

至于处于饥饿边缘的说法，这同从旧石器时代各种屠杀场堆积存下来的大量兽骨真是大相径庭。在欧洲和亚洲，大群的长毛象、马、鹿、驯鹿和野牛到处游荡。在捷克斯洛伐克，一处就挖出了上千长毛象的骨头；在法国靠近索留特累的高山上，在不同地段上因惊慌乱跑而跌落悬岩的野马残骸达1万匹之多；这证明了旧石器人有组织有效率地捕猎兽群的能力。此外，猎人自身的遗骨残骸证明这些人的营养状况非常之好。

那种认为旧石器人为了糊口终日劳作的观点现在也显得荒唐可笑了。作为果实采集者，旧石器人肯定不比黑猩猩差。实地调查表明，在大猿猴的自然栖息地，它们花在打扮、嬉戏、睡觉上的时间一点不比用于寻食的时间少。我们旧石器时代早期的祖先们作为猎人起码也具有狮子的那种本事——经过长时间的休息放松后，转而进行极紧张激烈的活动。对当代狩猎者和采集者如何分配时间所进行的调查更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多伦多大学的理查德·李手中有一个当代南非布须曼族的狩猎者和采集者们在觅食方面花费时间的记录。这些人居住在卡拉哈里沙漠区边缘，其水草丰饶程度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法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如此，每个布须曼族成人每天用不了3小时就足以获得有丰富蛋白质和其它基本营养的食物。

艾伦和奥纳·约翰逊对秘鲁亚马孙河畔的原始园艺家马奇根